

习近平对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发展

◇ 谢海军

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是执政的共产党基于一定时代背景和实践场域,在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立场、方法、理论上,打造标识性的概念、范畴,提出新的立场和研究范式,形成了系统性、逻辑性的理论观点的综合表达。因此,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创新,不是零碎的、片面地,而是要在矛盾生成场域、矛盾立场、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上,打造标识性概念、范畴,为话语体系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实现方法论的变革;诠释新的理论观点,构建自主性、原创性的理论体系。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矛盾话语体系构建的两个理论出场形态

首先,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矛盾话语体系构建的第一个理论出场形态,即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体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话语体系中概念、范畴的标识性特点,研究范式的恢复与重构,主要理论观点的原创性贡献,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

一是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话语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概念、范畴等标识性话语基础。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区别于西方和其它矛盾理论的显著标识性话语概念有: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社会基本体系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团结—批评—团结等原创性的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石。二是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的研究范式上,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三是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上提出了系统性、内

在逻辑的理论观点。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创立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

其次,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矛盾话语体系的第二个理论出场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理论。主要内容有:

一是在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的基础概念、范畴谱系上,构建了从过去单一政治属性的概念、范畴,向利益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等多元属性的概念、范畴谱系转变。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诸多概念、范畴的共性是政治属性导向,而改革开放后随着以经济为中心发展战略的确立,中国共产党打造了以利益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为主导,辅之于政治属性,具有多元属性新的标识性概念、范畴多样谱系。二是在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的治理理念有诸多新论断。三是社会主义矛盾治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提出了若干新观点。四是以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为场域,形成了既继承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区别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话语体系特征,同时具有内在逻辑和系统性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理论。在社会主义矛盾治理话语概念和范畴、矛盾治理理念、矛盾治理策略和手段、矛盾治理体制机制、矛盾治理目标上,形成了系统性、内在逻辑的新范畴新理念新观点,是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话语体系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矛盾话语体系的第二个出场形态,初步形成了改革开放时期,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理论。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的新发展

(一)在方法论上提出了矛盾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的范畴

首先,矛盾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的方法论,提升对矛盾的全局性及内在关系的把握。矛盾整体观拓展了矛盾两点论的观点,从矛盾关联性视角,对不同矛盾要素不仅要从事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等两点论认识和处理矛盾,而且把所有的矛盾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整体性把握。打破了仅仅从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或者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矛盾的两点论视角,从矛盾不同要素的整体性进行分析,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矛盾整体性战略思维的实践体现。

其次,注重矛盾的整体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统一,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习近平特别强调矛盾整体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性。一方面,注重矛盾化解的整体性,协同性,防止矛盾化解的单兵突进。另一方面,又注重矛盾的“重点论”。

矛盾“整体论、关联论和协同论”的内涵上,比矛盾“两点论”更全面和系统地看待矛盾内在关系,其内涵超过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两者对称性,打破了仅从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或者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视野,而是从矛盾整体性上来观察和认识矛盾,依据矛盾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把所有相关的矛盾要素作为一个整体认识和治理矛盾,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矛盾认识论和方法论。

(二)在矛盾认识论上提出“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新概念

首先,“问题意识”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各种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习近平强调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复杂问题和挑战。习近平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中矛盾

普遍性的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了认识矛盾中的“问题意识”。

其次,问题导向就是在认识 and 解决矛盾过程中直面矛盾,把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有机统一。正是具有这种直面矛盾的政治勇气与担当,习近平才能辩证分析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机遇期,既面临机遇,也遭遇重大风险挑战,客观、全面地认识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从而为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

(三)在“社会主义存在什么样矛盾”层面上提出了新观点

1.在社会主义矛盾存在和变化条件维度上,提出了新时代历史方位的新论断。历史方位与发展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认识基本国情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方位。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转化,形成了主要矛盾存在历史方位新变化与社会主要矛盾新转化的互动关系。

新时代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表明我国现代化建设总的发展阶段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范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发生根本性质变化。同时,又根据事物的运行变化规律,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打破了过去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单一性和同质性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划分为性质相同但其特征又有所区别的若干发展阶段。从理论上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涵认识,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的深化探索。

2.在社会主要矛盾维度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内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经典性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是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任务、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这是改革开放后对社会主要矛盾新的科学判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成果。显示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规律,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呈现阶段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在新时代历史方位的精确判断基础上,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区别了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在某一个发展阶段呈现出单一形态,而是可以有多元的矛盾表现形式,把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认识。

3.在矛盾的全局维度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范畴。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在观察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统筹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深刻洞察中国矛盾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观点。

一是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过去狭隘的社会矛盾观,把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结合起来,把矛盾的价值属性、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军事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集合起来,构建了人民性、政治性、经济性、军事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多元安全和稳定观。

二是从矛盾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上,统筹国内与国外、传统与非传统、发展与安全问题、自身与共同安全,凸显安全的整体性,凸显国家安全的多维度多视角的观点。

4.在矛盾预防维度上,实现了从应急与危机管理到风险治理的构建。习近平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注重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从国内与国外更为宽广的世界视野,发展应急与危机管理理念、体制机制的内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险观。

一是在认识和处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中,实现了从应急管理理念到树立风险和忧患意识新理念的转变,体现出矛盾治理的源头思维和底线思维。习近平提出要把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贯穿和指导应对和处理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经济

风险、文化挑战、环境污染、网络舆情等各种纷繁复杂的挑战中。

二是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面临重大风险的内涵。从风险的空间维度,把国内风险与国际风险联系起来,拓宽风险的国际视野。从风险要素结构维度,从过去经济风险、金融风险、政治风险,拓展为除了上述传统风险之外的文化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社会风险、军事风险,构建了全方位、多领域的风险结构。

三是从矛盾的关联性上,提出我国孤立风险易演变为风险综合体的观点。

(四)在“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矛盾”层面上提出了矛盾治理的新方式

1.在强调综合治理前提下,强调矛盾治理的法治思维方式和权威性。首先,在处理矛盾的理念上,提出了法治思维方式,把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从过去的工具层面提升到理念层面。改革开放后,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强调运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着眼于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方式等具体工具层面。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维新理念新战略中,注重目标导向。在矛盾治理的法治层面,除了继承传统的多元治理手段外,特别强调法治化解社会矛盾的思维和理念,把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功能从工具层面到理念层面的相互贯通。

其次,在强调社会矛盾综合治理的同时,强调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的权威作用,提升了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的地位和功能。

2.在矛盾治理的体制机制上,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首先,在矛盾治理理念上,提出了从管理到治理理念的转变。从过去社会管理创新到社会治理的创新,意味着习近平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创新,意味着治理理念的革命和飞跃。

其次,注重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在社会治理体制上,比社会管理体制范畴的内涵上增添了“法治保障”的新内容”。在社会治理格局上,提出了共建共享共治的治理格局。在社会治理手段上,

强调“增强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3.发挥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改革动力和发展牵引力的整体与协同性。首先,习近平完善了基本矛盾在社会矛盾治理的作用,通过改革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提供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破解中国发展难题的决定性一招。肯定了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整个矛盾体系中起着全局性、决定性作用。

其次,提出了通过发展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牵引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又有特殊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特别是落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性制约作用更加凸显,这是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根本依据。

第三,理清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功能及其辩证关系,提出了改革动力与发展牵引力协同发力来化解社会矛盾。当前我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从根源上产生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方方面面的外在表现。通过改革动力来消除社会基本矛盾的障碍,可以从根源上解决社会矛盾。同时,社会主要矛盾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通过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可以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纷繁复杂矛盾的背景下,单一改革或者发展都不能很好解决社会矛盾,需要通过改革与发展的协同发力,为解决社会矛盾提供动力和牵引力。

4.创新新时代矛盾治理的手段和方式。首先,从矛盾源头防控上,强调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完善风险防控机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针对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经济换挡期,分析和判断我国复合性风险表现为:显性与隐性风险、国内与国外风险、一般与重大风险,呈现出交织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体现出习近平关于社会矛盾治理中的源头治理、底线思维、风险思维等新理念。

其次,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强调矛盾基层治理。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基层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我国社会矛盾治理的薄弱环节在基层。通过治理重心下移,将人、财、物向基层倾斜,夯实城镇基层社区治理和农村村级治理,使社会矛盾在基层提前防范,在萌芽状态早发现,及时化解在基层,避免矛盾扩大、蔓延和升级。

然后,在矛盾治理手段上,把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吸纳治理手段创新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矛盾治理手段上,鼓励基层群众进行矛盾治理的创新,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发现、吸纳、总结和提炼基层经验创新,先后总结和推广“网格化治理”、“精细化治理”、大数据治理、“互联网+”和社会“微治理”等治理手段的创新。

最后,在矛盾治理的策略上,根据矛盾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等特点,打破了过去单一治理策略,无论是在矛盾治理的手段上、矛盾治理环节上、矛盾治理方式上,强调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

总之,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发展,涵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场域,贯穿着“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矛盾,存在什么样矛盾,怎样处理矛盾”的主线,凸显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关系,打造了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等标识性范畴,提出了矛盾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的方法论,在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等方面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构建了新的系统性、逻辑性的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谢海军,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摘自《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